

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

宋 全 成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山东大学 欧洲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从德国移民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现并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外国移民潮:客籍工人潮、回归移民潮和难民潮,最终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关键词:德国;移民历史;欧洲一体化;新移民法

中图分类号:D523.8;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5)03-0086-08

迁移和移民,在欧洲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从欧洲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范围内的和超欧洲范围的移民和迁移现象,始终存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更加强了跨越国境线的移民的数量和规模。一向以德意志民族为自豪和骄傲的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其民族构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其统一的国界内,生活着一个多结构的、多民族的日益增长的移民人群,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工作移民(Arbeitswanderer),本土的以前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来自世界各地的寻求政治避难者(Ausländer)和其他的难民(Fruehlinge)。在原西德居住的外国人,从1960年到1990年德国统一,由68.61万人上升到524.18万人,增长了764%,到1992年12月达到650万人,到1993年12月达到680万人,增长了近1000%。其中大约有400万人,占62%,来自于从前的招募劳动力的国家。外国人的比例在西德从1960年的1.2%,上升到1990年的8.2%。此后在德国始终存在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990年德国的统一,并没有阻止统一的德国向着一个移民国家前进的步伐。1990年德国的82万迁入移民中,只有46.6万人迁出(+35.4万人),1991年92万人中有49.72万人迁出(+42.3万),1992年有移民98.69万人,有71.03万迁出(+27.6万),这还不包括没有在移民局登记的较高的“黑人”人数^[1](P230-231)]。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正成为欧洲移民现象的中心旋转舞台。正如德国研究移民的专家 Klaus J. Bade教授所说,德国在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2]。

本文拟从历史发生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9世纪末以来的德国移民历史进程作一初步研究。

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德国移民进程

1. 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

在德国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各政治党派和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关于外国移民问题的讨

收稿日期:2004-10-18

作者简介: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欧洲移民问题、国际政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03JD810003)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欧洲移民问题研究”(12110052182065)之研究成果。

论。在今天许多德国人看来,大量的外国人存在于德国的社会现象和事实,以及德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移民运动的社会碰撞,是非常危险的新的社会现象。但是,如果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跨越国界的移民运动和他们的不同民族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碰撞,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并不是例外,而是人类社会最发展的法则。在德国今天许多定居的被称为德国人的人群,实际上也是外国移民的后裔,上百万迁出的德国人在国外同样是外国人,就好像今天的外国人在统一的德国一样。

德国著名的移民研究的学者、Osnabrueck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MIS)的Klaus J. Bade教授,在其著作《跨文化的挑战——跨越国境的人们和跨越人的国境》(*Die Multi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 Menschen ueber Grenzen-Grenzen ueber Menschen*)中认为,在德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应当被唤起的是那些被称为“小德国人”和大量移居海外的“德国区”的历史记忆。在跨越大西洋到“新世界”的19世纪,德国一代人走出国门,就好像今天的“小伊斯坦布尔”或者是其他的移民后裔在多元结构的德国大城市中的移民区、或者像今天的柏林市有一个土耳其国家外的“土耳其城”一样,在19世纪的“新世界”里,也有许多大城市被强烈地打上了德国人的“德国-美洲人”的社会印记,这还不包括中西部的德国人。

Bade教授认为,知识发展与历史变迁的事实表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增长与发展,是与人群的迁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欧洲历史上看,在专业的工具书里,曾经是这样来看待内行的:他的能力,他的熟练技巧和实践经验知识,是通过漫游和迁移而增加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为了著书立说而漫游欧洲各国的原因。如果这样观察,那么,德国人自己也涉及到人群迁移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许多德国人在国外和许多外国人在德国,都是独特的社会组成部分,事实上经历了跨越国境线的移民事实的多种形式:迁出、迁入和过境的移民、从德国到国外的和从外国到德国的工作移民等等。

如果仔细考察德国的这段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不仅存在着人的跨越国境的迁移,而且也有着跨越人的国境的移动。在历史上,德国本土内也有跨越广大地区的强大的内部迁移,我们将这种内部迁移的人群,称之为工作迁移,从东西远距离的Ruhpolien到Ruhmasueren的迁移,从普鲁士东部到Montan工业化的Ruhr和Emscher地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德国的大量的难民和被驱逐者被迁移到南部或者是欧洲以外地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战争政策的直接后果^{[11](P232)}。

综上所述,德国历史的经验和社会现实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始终存在着多数人与少数人、本土人与外国人的冲突,这种冲突通过历史的追忆而复杂化,这也适应于从跨越国界的人的迁移到跨越人的国境的运动的相反的社会现象。在德国的历史中,在其国境内排斥少数民族,如犹太人,辛提人(Sinti)和罗马人(Roma)及其他少数人群,总的来说并不是连续的或者线性发展的。但可以清楚辨认的是:在19世纪早期的与外来人划清“美化的种族——罗马人”界限的道路。“人种的——国家的(种族)在19世纪晚期是针对外来移民的。20世纪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针对某些外国人的种族灭绝和由德国占领的欧洲对移民的残酷迫害,已经臭名昭著。直到盟军和苏联军队占领德国领土,德国才走出了对种族的、文化的、地区的和其他民族的恐怖犯罪的阴影。

2. 德国的根本变迁: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

必须承认的是,德国自身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社会变迁。迁出移民在德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直到今天实际上也依然存在。最早在12世纪中叶,德国开始了往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居民迁移。“Siebenbueger Sachsen”主要是从莱茵河和摩尔河到当时的乌克兰王国和俄罗斯。到18世纪,德语区随之而来的其他迁移大军,在乌克兰被称为“Banater和Sathmarer Schwaben”人。他们通过对外迁移,开拓和保证了德国的国土,他们因此而得到了诱人的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上的特权。研究俄罗斯的德国移民问题的德国著名学者Dietz Barbara和Hilks Peter在其著作《一体化或是孤立:在联邦德国的俄罗斯的回迁德国移民》(*Integriert oder Isoliert? Zur Situation russlanddeutscher Aussiedl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中认为,俄罗斯的许多小国,例如在黑海、高加索,甚至在伏尔加,自1924年起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自治的“伏尔加德国共和国”(Die Autonome Sowjetrepublik der Wolgadeutsch),这个共和国的主要社会成员是由从德国迁移而来的德国移民组成的,他们不远万

里,来到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和平相处。但 1941年,斯大林运用军事力量击毁了这个共和国,以此作为对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的报复。它的居住者被流放到苏联的亚洲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后裔在德国实现统一以后,作为 Aussiedler(外迁移民)回到了其祖先的家乡——今天的联邦德国^{[3](P135)}。

19世纪 30年代以前,欧洲大陆的外迁移民主要走向东欧和南欧,首先到俄罗斯和哈波斯堡国家(in die Habsburger Laender),他们的踪迹在世界大战时多次通过强迫迁移、文化压制和最后通过后裔的外迁移民而消失。

19世纪 30年代以后,德国大陆移民东迁的潮流让位于跨越大西洋的新世界移民的西迁潮流,其中 90%的外迁移民到了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中,出自对自由的渴望,首先是期望得到更好的经济利益和新世界的进步和自由梦想,大量的西欧人飘洋过海,去了美洲,德国也不例外。

移民外迁尽管在德国被作为经济上的损失和文化上的“放血”而受到指责,但它同时也被看作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对付令人担心的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安全阀门——移民外迁同时也是社会革命问题的出口。在当时政府看来,大量的移民外迁,也是社会革命和社会问题的输出,它避免了社会革命在德国的爆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大量德国移民的外迁。从 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有 550万跨越大西洋的德国移民到达了美国,至今美国已接受了总计 880万的德国移民^{[1](P234)}。

在威廉时期的德国,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西欧经济的高速发展,终于在 19世纪 90年代迎来了跨越大西洋的外迁移民的结束。西欧国家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紧张状况,首先吸引了跨越大洋的欧洲外迁移民的直接回迁——这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强大的经济增长中,曾经是劳动力普遍过剩的工作岗位出现了劳动力的紧缺。在 19世纪第三次和第四次大的外迁移民潮中,1880—1893年,有 180万德国人外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依据当局的估计,约有 120万外来的迁移工人(wanderarbeiter)进入德国。随后,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大量移民相继进入德国,德国正在逐渐实现着由移民迁出国家到移民迁入国家的根本变迁。

对移居海外的移民迁移的经济和文化损失的多方面的抱怨,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逐渐让位于对大量的大陆外来迁入移民(Einwanderung)幽灵的恐惧。担忧的不是来自欧洲的南部移民,而是跨越普鲁士德国的东部边界的东欧国家的大量移民。为此,普鲁士德国制定和实施了严厉的社会防御政策和移民政策,控制迁入移民,所有的外国工作移民都包括在这个防御控制系统内。依据普鲁士的防御政策,东欧国家如波兰的工作移民大多数被限制在普鲁士的东部,但在普鲁士德国的西部,来自德国东部相邻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服务,依然受到了欢迎。普鲁士的移民防御政策的核心是禁止迁入移民长期居住,因此规定外来移民必须在圣诞节以前,返回自己的国家,否则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惩罚和威胁面前,只要工作移民在圣诞节以前离开普鲁士,则普鲁士德国雇主就不会有任何麻烦。雇主为发展其经济,需要雇佣大部分的外国劳动力,因而雇主在工业和纺织行业不断与当局进行斗争,希望改变这种政策或者给予例外许可,以便能使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外来移民跨越圣诞节,而实现生产的连续性,但实现跨越年度的波兰劳动力被批准和同意求职的例外许可,大多是徒劳的。与此相反,普鲁士政府对来自南欧意大利的工人,却给予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在普鲁士的 Ruhr区,意大利的外来工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来往,在 Zuwanderung(迁入)和 Abwanderung(迁出)之间自由更替。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当局不再实行普鲁士的防御移民政策中的安全政策原则,而实行外国人的工作许可制度,以实现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性。当雇主指出,相应的工作,德国的求职者不愿或不能被使用时,则雇佣外国人被许可。这种许可的义务被称为新的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国家的劳动力管理部门作为先决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保持很低的数量,以实现既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又使外国工作移民不足以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低目标。到 1938年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对外国人的需求大量增加,但为了维持战争经济的需求,对外来工作移民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性的外汇政策,从而使外国工人工资的外流变得困难^{[4](P154)}。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数百万求职者涌入德国,做为遭驱赶的外国人和战俘的奴隶大军——纳粹战争经济的外国劳动力的补充。战争结束时,这些人成了被迫迁入德国占领区的移民(1000万至1200万)的主力。十几年以后,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面临着社会和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西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招募客籍工人,从而开始了外国人在德国工作的新篇章。德国也实现了由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新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像西德那样,在20世纪下半叶,打上了跨越国境的迁移和移民的深刻烙印。在1945年战争结束到1990年两德统一这段时间里,共有约1500万外国人来到了战后西德——有难民、战争结束时被驱逐者、战后来自东德的难民、外来移民以及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回迁者。另外,在德国统一前夜的西德,已经有大约520万的外来少数民族人群。

在被分裂和最终统一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区分为三次大的移民迁入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一是在东德和西德的战争难民和遭驱逐者的回归及一体化进程;二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西德从外国人的招募到客籍工人的移民及一体化进程;三是在1990年统一后的德国的回迁移民、难民及一体化进程(Einwanderungssituation)。

1. 战后德国的难民回归和客籍工人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较大的移民进入及一体化,是来自德国东部和来自东欧国家的难民和被驱逐者的回归。在西德被通称为“家乡被驱逐者”(Heimatvertriebene),在东德则使用了一个美丽的词汇,被称为“迁居者”(Umsiedler)。在西德战后的几十年里,颇有影响力的被驱逐者的组织是公开组织和活动的,他们将被驱逐者的回归作为被驱逐者的基本权利。而在东德,“从1950年开始以来,在可能的公开讨论中,许多移民问题、社会适应和移民外迁相联系的社会问题,被列为禁忌,很少被提及”^{[31](P231)}。

在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柏林墙的建立,占主导地位的移民问题,分为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东德引进的外国劳工。像西德一样,东德为了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而引进部分外国劳工,与西德相比,这部分外国劳工只占极少的比例。在东德,外国人就业只在极小范围内存在于国家约定的基础上。依据引进移民的规则,在官方场合,外国移民问题要么被禁止讨论和研究,要么仅仅作为进修学习的移民,其作用被低估。1980年,在东德的外国工作者(Auslandischen Werktaetigen)——像在西德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的大多数,工作在德国劳动力不愿意从事的职业领域,多是在一些艰苦工作环境下的直接生产面上。例如有3/4的外国工作者在倒班工作制上上班^{[5](P319)}。

与西德政府签订有期限的劳动协定、移民可以一定意义上融入西德社会不同的是,“在东德,外国工作移民被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管理着,与国家规定的界限相比,很少有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一体化的行动。他们被安排在隔离设施的集中营房中(Gemeinschaftunterkuenften)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并因此与东德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而远离东德的主流社会。外国工作移民似乎生活在东德社会的真空中。但是,这种隔离的政策,并没有消解外国劳工与东德人的意识冲突。相反,在东德主流社会中,却潜在滋生着针对外国人的紧张和敌对情绪(Fremdenfeindlichen Spannung),这种潜在的紧张和敌对在极权主义的强迫惩罚结束以后便公开明显地表现出来”^{[6](P125)}。这集中体现在两德统一以后,原东德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外国工作移民的排外暴力事件。

二是来自原东欧国家的回归者和跨越两个德国的边境线,逃离东德的社会主义社会而非法进入西德的非法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纳粹德国驱逐的战争难民,首先从东欧国家回到了德国,他们被看作拥有返回自己家乡的天然权利。这些难民和被驱逐者返回德国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德国的东部,而且在德国的西部也同样出现。当西德与意大利于1955年签署协定由政府当局组织招募外国劳动力的时候,许多被驱逐者和难民在他们“新的家乡”里,依然是陌生的,由此开始了西德再次社会一体

化的历史。同时,在冷战的体制和背景下,东德的一些人民,跨越两个德国的国境线,非法进入西德。这些非法移民在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被看作是不堪忍受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而逃亡民主、自由的西方社会的政治反叛者。他们在西德被认为是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强权地区而带有忏悔和反叛的特征,并因此在政治上被西德“合法地”接受,并作为流入的劳动力受到热烈欢迎。

战后德国历史上,第二次较大的移民进入是西德招募的大量来自于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的劳工而形成的客籍工人移民迁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西欧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面对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引进劳工协议或双边协议,大量引进劳动力,参与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194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移民局(ON I),专门组织招聘发展工业所需的外国劳工。西德后来者居上,成立了“招募委员会”。由于西德存在着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东德对东德人移民到西德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当时的西德开始了二战以后的招募外国劳动力的历史。1955年联邦德国与意大利、1960年与西班牙和希腊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协议。1960年,东德柏林墙的建立加速了西德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上移民国家的道路的进程。西德对外国劳动力的招募,在1961年东德结束涌入西德的移民潮流以后,得到了加强。1961年与土耳其、1964年与葡萄牙、1968年与南斯拉夫、1963/1966年两次与摩洛哥、1965年与突尼斯签署引进劳工的协议。据德国移民与难民局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500万外国劳工来到了西德,西德由此进入了“客籍工人的时代”。但是,对于从外国招募来的外国移民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和一体化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后果问题,在西德却没有一个长久和全面的应对计划。外国人政策在数十年里仅仅作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核心,而不是移民政策的核心,被使用于外国人。

在西德,“客籍工人时代”的结束是与1973年全球性的“石油停止供应”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他西欧主要国家一样,到70年代,西德也减缓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增长的步伐。依据引进劳工的协定,“客籍工人”的居留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需要在服务期满后回国。这种“客籍工人”的流动性,一方面,在防止外国劳工的长期滞留、降低在西德的外国人的数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客籍工人的流动性也不利于工作技能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西德政府力图使那些具有相当工作技能的外籍劳工留在德国。同时,外籍劳工中也在增长着谋求在德国获得长期居留许可的努力。于是,当时西德政府对客籍工人提出,那些不想与自己出生国的家庭分开的外国劳动力,只能二者选择其一:要么返回自己的家乡,要么全家迁到德国来。结果,有300多万人留了下来,并随后通过家庭团聚政策举家迁到德国。家庭的迁移和外籍人口的自然增长,使西德1979年的外国人口,已经再次上升到1973年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居留期间同时增长的是从客籍工人到永久移民的连续的长期居留的强烈愿望。从1980年开始,西德那些来自于过去客籍工人人群的外国少数人群中的大部分,生活在一种德国政府认为的“非移民国家”的长期矛盾的移民现状的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移民的社会一体化问题被西德的政界所否认,在管理机构中也被列为禁忌,在政治决策中被压抑和排斥。关于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也合乎逻辑地被终止讨论,自然在机构和政策上,也没有任何的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安排。正如欧洲移民研究专家 Klaus J. Bade 教授所说,人们将其列为禁忌的东西,无论在政策上、机构上、措施上是不可能被设计和安排的^{[5] (P223)}。

2. 德国统一进程中的“本土外国人”、“陌生德国人”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在和平的欢呼中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但也同时迎来了德国战后历史上第三次以东欧回迁移民和难民为主力的移民潮。

德国的国籍法实行血统法,只要得到德国有关部门的确认,具有德国血统,原东南欧国家的移民,可以自然获得德国国籍而回归德国。于是,在冷战结束后,大量只具备居住国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甚至对德国文化缺乏基本了解,更多的甚至不懂德语、但具备德国血统的原东欧国家的移民回归德国。这就出现了 Klaus J. Bade 教授所说的那种“从小居住在德国,通晓德语和德国文化、但不拥有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和从小居住在外国、不懂得德语和德国文化、但拥有德国国籍的德国人”^{[7] (P12)}的

滑稽场面。

1990年之前,统一进程中的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一体化情况(Eingliederungssituation)是一直被人们忽视的,无论是社会大众的层面,还是德国政府的层面。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德国人沉浸在两德统一的民族喜悦中,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生活经历等多方面的考虑,对没有解决的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和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一体化问题只字不提。

在德国的第三次移民大潮中,“本土的外国人”、“陌生的德国人”等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群体,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存在着的亟待解决的移民社会一体化问题的集中体现。

第一,德国本土的外国人。过去是、现在是、今天依然是最大的移民群体,就是已经有了第三代的客籍工人人群(Gastarbeiterbevölkerung),这是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客籍工人政策的一个结果。客籍工人这一群体,由于德国后来实施的家庭团聚政策,而变得日益庞大。就客籍工人的来源国别而言,主要是来自土耳其和意大利。这些德国本土的外国人,在德国被看作是少数民族,他们大多在德国已经有了第二代,甚至有了第三代,其中第一代先锋移民已经到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

第二,陌生的德国人。是指拥有德国国籍,但对德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经济等缺乏了解的来自于东欧国家的移民群体,这是移民的第二支大军。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每年有数十万的迁移到德国的来自东欧国家的陌生的德国人。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冷战的结束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中东欧国家冷战时代形成的严厉的移民政策被废止,于是,中东欧国家的拥有德国血统的移民,蜂拥而来,进入德国,每年达到40万人。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潮,使德国政府面临着的移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到90年代末,德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提高了移民的条件,同时限定了移民的指标,规定每年的进入指标是10万人。这些限制性的措施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移民申请从过去每月12000份,下降到2002年的6000份,下降了50%。这些来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尽管被赋予了德国国籍,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地生活在过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对德国依然是陌生的——他们是带着沉重的心理和精神负担回迁德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处于一种真正的移民状况和移民环境中(Einwanderungssituation)。

3. 在德国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

从1980年开始,不断增加的经济难民、战争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的数量,构成了德国新移民的第三支大军。依据德国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数据,在德国,避难申请者的数量从1953年到2003年,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而后再逐步下降的过程,以1992年为高峰年。

一直到80年代中期,难民(特别是政治避难者)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冷战思维和政治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起初的政治避难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德国的欢迎和鼓励,他们是作为输入的劳动力而被接纳的。因而,这类移民的数量激增。每年有数十万人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1989年至1992年,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来自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避难者的数量激增。1992年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上升到最高峰,达43.8万人,但实际上真正属于受政治迫害的申请者不到5%。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移民社会问题的凸显,德国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避难法。德国政府和各主要政党围绕避难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各主要政党就新的有限限制性的政治避难法达成了一致。1993年7月,德国联邦议院以2/3的多数票通过了新的政治避难权法——避难妥协法。此法规定,来自国内政治局势稳定国家的外国人无权申请政治避难。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予以大量接纳的模式。于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政治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但却又明显刺激和提高了非法的国内居留者的数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更加快了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进入德国的步伐。由于地缘关系和地缘政治因素,大量来自于中亚、西亚和东欧国家的战争难民以及与之相随的经济难民,与政治难民一起进入德国。从2000年到2003年在德国申请避难的难民来看,主要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前南斯拉夫国家、阿富汗、俄罗斯联邦、越南、伊朗、印度(见表1)。

表 1 2003年德国难民申请者主要国别及变化情况^[8]

主要来源国		变化情况			
国别	2002(千人)	2003(千人)	增加百分比	绝对量(人)	
1	土耳其	9.575	6.301	-34.2	-3274
2	塞尔维亚和黑山	6.679	4.909	-26.5	-1770
3	伊拉克	10.242	3.850	-62.4	-6392
4	俄罗斯联邦	4.058	3.383	-16.6	-675
5	中国	1.738	2.387	37.3	649
6	越南	2.340	2.096	-10.4	-244
7	伊朗	2.642	2.049	-22.4	-593
8	印度	2.246	1.736	-22.7	-510
9	阿富汗	2.772	1.473	-46.9	-1299
10	阿塞拜疆	1.689	1.291	-23.6	-398

从表 1 可以看出,以下三个因素影响了在德国的难民申请者的国别分布。第一,战争因素。只要爆发战争的地区,特别是距离欧洲主要国家不远的中东和东欧国家,由于地缘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总是有大量的难民进入西欧国家,特别在前南斯拉夫内战、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二,民族冲突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局部冲突,特别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俄罗斯的车臣民族冲突、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等等,成为产生难民的重要因素。第三,传统因素。尽管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德国在二战以后,没有殖民地因素的影响,但是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和避难传统国家的避难者,仍然想在德国避难,这似乎成为一个传统。变化的国际形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 1993 年以前德国宽松的避难法,似乎也鼓励了这一传统的继续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西欧主要国家近几年来,利用 2000 年的“多佛尔惨案”和 2004 年的莫克姆海湾中遇难的中国非法移民的事实,通过社会传播媒体,过分渲染中国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包括难民)在西欧的存在。通过德国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上述数据来看,最近二年来,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数在迅速锐减,特别是前十位的难民申请国,但来自中国的申请避难的人数却在迅速增加,2001 年是 1625 人,排名第 13 位,2002 年是 1738 人,排名第 11 位,2003 年是 2387 人,增长 37.3%,净增 649 人,已进入德国难民申请国的第 10 位,但是,中国难民在德国的总难民申请人中的比例依然很小,仅占 3.5%。

三、结论:德国已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通过对德国移民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我们发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外国移民的少数群体与德国本土多数人、外国人与德国人的关系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还是一个净移民输出国,就好像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现了由移民输出国到移民输入国的根本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后,德国首先通过国家间协议,接受外国劳工,从而揭开了外国移民大量进入德国的历史新篇章。特别是柏林墙建立以后,德国加快了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移民国家的步伐,进入了接受移民的历史轨道。尽管到 1974 年,由于全球性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欧国家收紧移民政策,并实施“零移民”政策,进入德国的外国人人口的增长,出现大的下滑。但 90 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及随后的战争,又使德国的外国人人口大幅度增长。从 2000 年以后,这一增长的趋势日趋平缓(见表 2)。

目前,在德国 8253 万总人口中,有外国人 733.47 万,外国人比例占总人口的 8.9%。因此,德国已成为非典型意义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施罗德政府从 2000 年起,便通过实施绿卡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技术专家来德国工作和生活,同时,组成超党派的移民委员会,审查德国的外国人政策、难民政策等,组织起草新移民法,以适应德国的移民社会状况。经过 2 年多的磋

表 2 德国 50 年人口发展、外国人口及比例表^[9]

年份	总人口	外国人口	外国人口比例	外国人口变化率
1951	50808900	506000	1.0	-
1961	56174800	686200	1.2	+35.6
1971	61502500	3438711	5.6	+15.5
1975	61746000	4089594	6.6	-0.9
1980	61653100	4453308	7.2	+7.5
1985	61020500	4378942	7.2	+0.4
1990	63725700	5342532	8.4	+10.2
1995	81817500	7173866	8.8	+2.6
2000	82259500	7296817	8.9	-0.3
2001	82440309	7318628	8.9	+0.3
2002	82536700	7335592	8.9	+0.2
2003	82531671	7334765	8.9	-0.0

商,德国各大党相互妥协,最终在 2004 年 7 月就移民法的生效达成了共识。新的移民法已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德国人口中的外国人的国别、年龄、结构、文化、职业及前景等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将在论文《德国社会中的外国人:现状、结构分析及前景》中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 [1] Klaus J. Bade. *Die Multi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 Menschen ueber Grenzen-Grenzen ueber Menschen* [M]. Muenchen: Beck 1996.
- [2] Klaus J. Bade. *Drehscheibe Deutschland: Wanderung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J]. Deutschland Frankfurt: Frankfurter Societaets-Druckrei GmbH. 2000. 12.
- [3] Dietz Barbara, Hilks Peter. *Integriert oder Isoliert? Zur Situation Russlanddeutscher Aussiedl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 Muenchen: Beck, 1994.
- [4] Klaus J. Bade. *Deutsche in Ausland-Fremde in Deutschland: Migrat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M]. Muenchen: Beck 1992.
- [5] Klaus J. Bade, *Europa in Bewegung, Migration von spaeten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M]. Muenchen: Verlage, C. H. Beck, 2002.
- [6] Weidendeld Wemer. *Das Europaeische Einwanderungskonzept*[M]. Guen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1994.
- [7] Klaus J. Bade/Mainer Muentz. *Das Manifest der 60: Deutschland und die Einwanderung*[M]. Muenchen: Verlage G. H. Beck 1993.
- [8] http://www.Bundesamt fuer Migration und Fluechtlinge.de/Statistik-Asyl/Die_aktuellen_Asylantragszahlen_von_2001_bis_2003.html
- [9] <http://www.Bundesamt fuer Migration und Fluechtlinge.de/Statistik-Auslaendem/Auslaendebestandsdaten.html>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erman Immigration

SONG Quan - cheng

(College of Intemational Relations, Rem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Research Institute on Europe, Shandong University, Ji '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Viewing o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Geman immigration, there has always existed the phenomenon of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Geman. During the World War , there had realize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from a state of emigration to immigration. And after the World War , Geman has experienced three times of large immigration including the tides of foreign workers, return emigrators and refugees, which has finally made Geman a state of immigration on a non - typical sense.

Key words: Geman; History of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of Europe; New immigration law

[责任编辑 刘京希]